



目录

忧伤的叙事策略

引言.....	员
第一章摇都市民间：1980年代以来都市叙事研究视角新探	缘
第一节摇 从“城市”到“都市”：一种叙事主题的潜变	缘
第二节摇 “都市民间”概念的特征性思考	愿
第三节摇 1980年代以来都市叙事民间因素初探	缘
第二章摇寻找“阿莱夫”：都市民间精神主体的显影方式	猿
第一节摇 都市怀旧梦与知识分子的精神空场	猿
第二节摇 民间美学精神的个人重塑	愿
第三节摇 徘徊于智性和审美之间	苑
第三章摇知识分子的原始正义与都市底层的弱势言说	愿
第一节摇 都市底层移民叙事：来自边缘处的声音	愿
第二节摇 失土的“泥鳅”与无声的尖叫	员圆
第三节摇 两难处境与现实主义写作	员圆
第四章摇在身体的世界里：民间叙事的个人政治修辞之一	员源
第一节摇 身体与民间：被转换的叙事策略	员圆
第二节摇 都市民间叙事的欲望辩证法	员圆
第三节摇 回归身体与精神试错	员象

第五章 解读“民间”：文本实践的“间性”游走	员源
第一节 摇文化比较视野中的概念辨析	员缘
第二节 摇面向“民间”的当下性	员园
第六章 摇民间影像：新生代电影叙事的价值询唤	员远
第一节 摇新生代电影“民间质素”分析	员远
第二节 摇都市底层世界的欲望漂流	员园
第三节 摇寻找都市叙事的“确定性”	员员
 附录	
“民间”的“地气”断了之后	圆远
影像“原乡”与民间叙事	圆远
在精神局限与人文良知中追问生存真相	圆原
“民间”精神的当代知识境遇	圆园
 参考文献	圆缘
后记	圆园

引 摇 言

为求得理解的便利,笔者想从以下几方面的思考引入本书关于“都市民间”这一研究课题的讨论。

第一,该课题研究的缘起: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文化与文学发展都步入了一个新的转型期。围绕这一文化格局的描述诸如“无名”、“喧哗”^①、“杂语”^②、“多元化”和“个人化”等等词汇,大都已经成为学术界的基本共识。上述看法之于进入新世纪之后文学与影像叙事发展现状的描述同样是有有效的。显然,1990 年代文学和影像叙事的发展与演变受到了世纪末中国社会转型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而同样地,1990 年代的都市叙事也以其自身的独特面貌反映了并参与着世纪之交中国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日常生活等多重领域的现代性变动与价值重构。这个作用 反作用的张力场一直持续到今天,而且将会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内继续显示其重要的影响。

以上术语的描述基本上概括了 1990 年代以来的中国都市叙事处身其中的社会文化现实。而我的思考则是穿过这些比较宏观的文化现象描述与语词的表层,从一个相对微观的角度入手,进一步体察艺术创作者个体内在的精神世界建构在他(她)的文学或影像作品过程中是以怎样的审美形态表现出来的,与此同时又通过何种方式表现出自身

① 参见张志忠:《世纪末的喧哗》,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 年版。

② 参见王一川:《杂语的时代》,天津:《文学自由谈》,1995 年第 1 期。

美学特征的独特性与不可替代性。这句话也可以这么理解,面对“无名”时代的精神氛围,知识分子采取了一种什么样的立场,又是以怎样的叙事审美创造与叙述形态重塑,在文本的世界里借助一己之力修补、恢复都市叙事与当下社会现实生活之间的精神关联,进而获得把握问题、解释问题的新的文化价值取向。

第二,方法论问题:

在 1980年代以来都市文化创作的“无名”格局中,笔者有意将那些自觉疏离于强势意识形态话语系统之外的知识分子创作作为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相对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这些不和谐的声音显示出较为鲜明的民间性和边缘化的特征,而对这种立足于边缘化角色的主动认同也使得他们的创作面临着更为复杂的社会文化现实。

首先,1980年代以来都市文化生态格局的“无名”状态,形成了对主流宏大叙事“共名”的多层次拆解;而作为“无名”格局中的一种声音,坚守知识分子民间立场的创作显然也丰富了当下都市文化的表现内容。“无名”与“民间”这两个指称彼此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交叉,但不能将这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起来理解。

其次,从理论上讲,知识分子的民间创作都天然地站在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相异的另一极,是以自身独特的现代性美学追求来完成对主流意识形态所鼓吹的现代性的“解魅”。但在具体的文化现实实践中,这样的自觉疏离又常常受到市场经济、政治禁忌和文化现实生存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因而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知识分子通常会采用审美层面上的美学暴动——如对主流化的叙事主题的逆转、通过对原有叙事对象的反讽以及叙事内容的重述等多种方式——实现对主流意识的批判和解构,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会注意到,文本中所体现出的某些个人化的精神探索也可能会因为多重意识形态的掣动作用而逐渐偏离了最初的叙事期望与价值指向,而变得虚无与高蹈。

再次,知识分子立足民间立场的都市文学写作,在审美形态表现上可以表现为对个人精神世界的坚守,进而完成反抗主流话语的政治修辞;也可能会超越个人轱辘流的二元对立,在崩落的文化传统记忆的碎片中重新整合出虚拟的民间审美形态,借以抗拒主流话语与商业意识

形态的精神侵占;也可以通过对现实生活的近距离关注和描写,以客观现实主义的纯然再现,直接戳破新的意识形态的谎言。在思考以上问题时,我所借助的方法论主要来自于杰姆逊“意识形态的动力学”理论的启发,即“一个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将会探索其权力的合法化的种种策略,而一个对立的文化或意识形态则常常以变通的或隐蔽的策略来抗拒和瓦解支配的‘价值体系’”。而在面对 1990年代以来都市文学与艺术创作的复杂现象时,“都市民间”视角就是进入上述问题的一个理论入口。

第三 基本概念的界定:

“都市民间”这一概念最早曾出现在《民间和现代都市文化——兼论张爱玲现象》^①一文中。具体到中国 1990年代都市社会更见其陌生的文化现实,本书试图对这一概念做出以下粗线条式的特征性描述:

“都市民间”是隐匿于现代都市庞杂意识之中的一个审美文化空间。它与都市文化中的日常生活记忆和底层个体存在的边缘意识相伴而生,相对于主流意识话语而言,它处于权力边缘化的弱势一极,是现代知识分子转移庙堂、广场的价值取向后,以平等的姿态参与都市文化书写与精神建构的一种新的写作立场;它以破碎、虚拟和朴素的审美形态表达出对都市现实生活的多重的人性化体认,因而体现出藏污纳垢的本土现代性美学风格。

第四 论文各章与附录中涉及的研究内容:

第一章:围绕“都市民间”概念的特征性描述,进而具体讨论 1990年代以来大陆都市文学叙事实践过程中所体现出的知识分子本土现代性追求;

第二章:以王安忆 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以“上海”为题材的系列小说创作为例,探讨精英知识分子写作者如何在主流的都市意识形态神话之外寻找民间审美精神主体自我彰显的过程;

第三章:勾勒都市底层移民文学的形成与分化过程,借助文本还原

^① 陈思和:《民间和现代都市文化——兼论张爱玲现象》,上海:《上海文学》,1992年第 5 期。

来自现实民间世界的声音,讨论知识分子的原始正义观念与底层写作实践,发掘知识分子介入现实生活的批判性精神力量;

第四章:以 1980 年代以来都市文学中盛行的身体叙事为切入口,在个人政治修辞学的意义上理解知识分子立足于民间立场上叙事策略的转变,并探讨其现有的美学不足与精神超越的可能性。

第五章:辨析“市民社会”、“民间社会”和“都市民间”等三个概念在不同社会历史时期和各自特定社会文化语境中所承担的意识形态功能,借此进一步说明“都市民间”视角对于当下知识分子参与都市文化现实空间创建的重要意义。

第六章:也可以称之为“外一章”,是我近期思考的初步成果。以民间视角对 1980 年代以来的一批新生代都市电影叙事展开研究,检验“都市民间”这一概念的跨文本阐释空间。

还需要交代的是,虽然我在前期构思阶段也考虑到了 1980 年代以来文学叙事中“乡土民间”与“都市民间”之间形态转型问题,但限于时间和学力,尚未进行专章研究。因此特列“附录”,希望能够借助几则个案分析加以补充说明。此外,“网络文学”作为 1980 年代新生的重要都市文化空间,本书未及进行专门的讨论。这些遗憾都希望能在此后的研究中得到弥补。

第一章摇都市民间 袁慰园年代以来都市 摇叙事研究视角新探 摇

第一节摇从“城市”到“都市”： 摇摇摇摇 一种叙事主题的潜变

为求得叙述的方便 在本书的开篇 我想首先就某些基本概念的使用做出约略的交代。首先是“都市叙事”的指称。尽管在我们的日常用语里，“城市”和“都市”这两个词是可以相互置换的，在具体的使用语境中也不会产生太大的歧义，而且具体到文学和影像叙事领域里，所谓“都市叙事”和“城市叙事”的表现主题、内容和研究对象，事实上也常常避免不了相互的交叉与重合，但在本书行文中，我依然倾向于使用“都市叙事”这个概念。

—

从字面的意思来理解，汉语言中“城市”这个词是由我国古代“城”与“市”这两个概念结合而成的。“城”是指四面围以城墙、具有防护作用的军事要塞。《管子·度地》中说：“内之为城，城外之为郭。”《古今注》中说：“城者，所以自守也”，“筑城以卫君，造郭以守民”。这说明早期的“城”的概念偏重于政权统治的功能，是朝廷或官方政府力量的所在。与之相对的“郭”则是民众聚居的地方，所以城在内部、在中心，而“郭”在城的外围和边缘地带。清代表枚在《雨过湖州》中曾赋有佳句：

“州以湖名听已凉，况兼城郭雨中望。”

与“城”的基本功能不同，最初的“市”则专指商业交易的场所。《易·系辞下》中说：“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由于早期的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市”就往往聚集在众人汲水的井边，由此“市井”连用，偏重于市场和街市的意思，如《管子·小匡》中就有“处商必就市井”的说法。《周礼·地官》中则有更为详尽的说明：“大市，日昃而市，百姓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而随着社会分工的出现、私有制的确立和商品经济的不断发展，商品的交易和流通日益成为影响人们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而货物贸易的聚居地也同时成为构建城区的中心。在政治与经济双重合力的作用之下，“城”与“市”两种形态逐渐合而为一，再经由长期的发展与演化，最终形成了较为成熟的古代城市的布局与结构形态。

我们可以看到，在乡土中国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城市这个独特的地理处所一直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城市的形成、发展、繁荣、迁移或衰落，常常作为周边地域社会文明演变历史的缩影而受到后世社会学研究者的重视。在特定的历史阶段里，它们通常是国家和某一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交流中心，是人们赖以实现各种欲望需求、满足各种消费享乐的集体场所，同样也鲜明地体现出了某一地区的民俗文化特征和物质文明的发展程度。城市的发展与变化在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程度不同的生动体现，由此，文化形态构成的地域性差异就成为中国城市文学滥觞以来所着力表现的潜在主题之一。譬如最早的城市文学作品之一、南宋孟元老撰写的《东京梦华录》，通篇都在缅怀中州旧日繁华和故都汴梁的盛貌，其中也大量地记载了中州故地的民风民俗，直到今天仍然是考察彼时彼地风俗民情的重要文献资料。

同样地，通过文学反映出不同城市文化性格具体的地域性差异，这些在小说的叙述语言中同样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如近代文学家韩庆邦引领海派文学之先声的小说《海上花列传》，通篇大量地使用了香艳呢哝的苏吴口白，因此更适宜江浙地区市民大众的阅读趣味。可以看出，在此类作品提供给读者独特的文学审美经验中，不仅携带了从新的社

会时代精神里嬗变而来的某种新的文学现代性审美风尚,而且也通过对同时代公众阅读趣味的引导,或多或少地影响到读者对于文学作品和流派分类的基本判断,使得我们对文学“海派”内涵的理解从一开始就携带了某些地缘文化厚积深重的历史影子。这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在 1930年代文学界“京海之争”那段聚讼沸然的历史公案。1936年作家沈从文著文批评了当时文坛流行的“玩票”、“白相”习气,进而提倡“厚重”、“诚实”的文学态度。^① 尽管当时沈氏之感发并不在于文坛上所谓南北地域之分,然而此后一系列言辞激烈的回应文章,大都一厢情愿地将“海派”和“上海作家”划归一谈^②,或为辩驳,或为正名,为此闹得沸沸扬扬,直到今天余音犹在。而这场被部分当事者最终视为“无谓”的论争,在今天看来,除却持论者概念理解的随意性和情绪表达的狭隘之外,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还在于长时期以来沉潜于北京、上海、北方、南方地域分殊的某种常识性理解所形成的文化偏见,这恰恰又回到历史上京海之争的老路子上去了。

应当承认,城市文学对于被表现对象的现实性地缘文化特征的关注,是内在于世界城市文学发展历史中的一个普遍题旨。一方面,世界上不同城市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逐渐熏染滋生的气质与性格,深深地影响了文学城市的形象塑造和精神审美形态,使之相应地具有了各自不同的文化胎记。另一方面,在城市发展历史的前期,由于受到地域阻隔与民族文化的交往局限,世界城市在地理、经济、社会、文化、语言、政治制度、自然环境直至建筑文化形态上各自所表现出的自足性,导致了处于农业文明笼罩下的古代城市社会、城市文化的生成形态及其相应的文学审美表现,也相应地表露出相当明显的地域文化的特征性差异。这都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内,城市文学与其所在地域(或区域)民俗文化之间的整体性构成特征和彼此相生相成的依赖

^① 参见沈从文:《文学者的态度》,《大公报·文艺副刊》,1936年5月15日,第1期。

^② 参见苏汶:《文人在上海》,《现代》第1卷第1期,1936年5月;阿英(署名“青农”):《谁是“海派”》,《申报·自由谈》,1936年5月10日。相关的争论文章还可见于当时的《大公报》、《中央日报》和《太白》等报章刊物。

性关系。比如 17世纪流行于欧洲城市文学中的巴洛克文体,它崇尚阴冷的情调、夸张的比喻、华丽的辞藻和参差复杂的笔法,这与彼时欧洲城市建筑和装饰的风格极为相似。而同一时期的日本江户时代则以町人阶层“好色物”的经济生活为主要特征,以他们颓废虚无的精神观念为描写主题的浮世绘也就应运而生。

中国小说起源于城市,这早已为历史学界的考证所充分证实。在中国城市文化的审美流变过程中,也常常以大量的地域文化和乡土民俗风情作为其所依恃的现实性社会背景。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由文人独立创作的长篇小说《金瓶梅》,它和冯梦龙的“三言”、“二拍”共同推动了中国白话市民小说的发展。自北宋话本小说兴起之后,此后这种反映新兴的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世俗娱乐欲望和审美情趣的文学传统,在明清的绣像小说和民初的鸳鸯蝴蝶派文学中得到了继承,并一直明昧乖舛地延续到当代。这样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的文学评论者来评价老舍、汪曾祺等人浸淫着传统市民文化气息的小说创作,还不外乎以所谓“民俗风情画”之类的修辞来作为对作家作品的最高褒扬。^①这一方面固然是受到了写实主义批评理论的影响,但也应同时说明,他们对市民文化和都市文学的理解和评价基本上仍旧是从地域文化的角度切入的,至今也依然不失为一种能够继续发挥成效的研究思路。这方面最新近的例子就是 1994年前后在《东方》杂志连载的一系列城市文化写真^②,也是通过一系列各具特色的关键词罗列,以“地域人格化”的文人眼光来传达潜隐于不同城市日常生活表层之内的地方感性精神。

然而以上只反映出问题的一个侧面。在我看来,依照研究对象所

① 类似的评论在传统的作品研究和文学史理论的叙述中俯拾皆是。

② 这一系列城市写真包括:《何谓精神生活——以北京为例》(尹丽川),《何谓本能生活——以成都为例》(洁尘),《何谓感伤生活——以南京为例》(魏微),《何谓城市生活——以哈尔滨为例》(朱碧),《何谓感性生活——以海口为例》(李少君),《何谓日常生活——以昆明为例》(于坚),《何谓市民生活——以上海为例》(张闵),《何谓享乐生活——以苏州为例》(朱文颖),《何谓时尚生活——以天津为例》(朵渔),《何谓悠闲生活——以西安为例》(秦巴子)和《何谓诗意生活——以厦门为例》(丹娅)等。

处的地缘文化和传统民风民俗的具体考察,进而阐明城市历史演变、现实存在形态以及想象未来的发展空间,这只是面对城市文化叙事诸多研究思路中的一种。在承认其有效性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它在另一个方面所产生的理论遮蔽,即这样的思路无法进一步呈现出在世界城市漫长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城”与“市”两个要素之间彼此消长的真实情形。

二

如果辩证地用一种世界性的眼光来看,就会发现,现实社会中存在的“市”与“城”以及它们彼此所代表的文化意识形态之间的对峙和分离,几乎从世界城市历史的开篇伊始就一直如影随形。不可否认,在世界资本市场萌芽的最初阶段,的确需要借助城镇这种区域性的政治军事中心为市民提供固定的商品交易社区和财产庇护所。直到中世纪以前,西方城邦的存在都一直为资本的生产消费和市民的世俗生活提供了稳定有序的制度保障。^①“城市空气使人自由”^②,在这样的历史土壤中孕育出新兴的市民政治文化,它们部分地满足了市民阶层渴望安全感、归属感、热爱自由和追求世俗欲望的天性。而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历史中,凭借高大厚重的、层层包围的城墙围筑而起的城市也是商业贸易的集散区域和手工业者阶层的主要聚居地。它不仅承担了对外交流和商业经贸交往的门户功能,同时也以一种强势权力向周边幅员广阔的乡村地区完成着经济辐射和政权控制。这也就是古代建制形制中所强调的“度地卜食,体国经野,都鄙有章”。

然而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早先城市形象所代表的权力体制、等级分层、贫富落差和经济掠夺,不仅与城市中新兴的市民工商业者阶层对

^① 参见穆罕默德·哈塔米著,马贵生译:《从城邦世界到世界城市》,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1999年版。

^② 汤普逊著,耿淡如译:《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下),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140页。

自由贸易和政治权力制衡的自发要求相抵牾,而且也渐渐开始不见容于地处城市外围边缘更为广大的乡村世界。我们看到,历史上形成的城乡对峙和社会阶层划分,直到今天仍然阻碍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整体发展。而在城市社会组织机构内部,中世纪西方封建城市社会中出现的市民阶级,已经开始成长为与封建社会结构存在了巨大离心力且难以被封建社会结构所同化的新的社会因素。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如何重新看待“城”与“市”的关系,并且进一步剥离它们各自所承担的意识形态功能,就成为世界城市发展必然要遭遇到的时代分水岭。我们看到,欧洲最终通过一系列资产阶级城市革命摆脱了黑暗的中世纪的束缚,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而相比之下同一时期内的中国城市之“城”所代表的政治意识形态统治功能,对新兴的商业市民阶层依然具有强大的抑制力和同化能力。尽管如此,“市”对于“城”自发的离心运动在中国古代的社会生活中依然有着自己独特的表现形式。自唐以来,随着抑商思想的减轻以及商业的繁荣,相伴而来的是整个社会的开放。具体表现在城市的内部建制中,可以看到唐代里坊的瓦解与市场的发展过程也是同步逆行的。先是居民房屋开始冲破坊墙,直接向街道开门,甚至将屋宇建在街边。为此唐代政府曾明令禁止。到唐后期,居民向街开门、侵占街巷已是普遍现象。而城市宵禁制度的废弛和城市夜生活的兴起,即成为城市破除封闭、面向开放的重要标志之一。与此同时市民阶层与官方的矛盾冲突也渐渐趋于表面化。唐代商人曾经因为官府肆意掠夺造成“家著被盗”的惨境而集体罢市,“市民相率遮邀宰相哭诉”。而到了明朝中后叶,矛盾则进一步激化升级为苏州地区大规模的机工暴乱。^①这些现实性问题在艺术作品中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表现。当时的一幅《南都繁会景物图卷》^②曾经生动地反映了明中期都城南京的繁荣场面:在一个大全景的画面,各种商店摊铺比比皆是,坊肆之间人群摩肩接踵,以至于遮没了道路。该图纵源厘米,横

^① 参见徐勇:《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8年版,第100页。

^② 参见路应昆:《中国戏曲与社会诸色》,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封一。

猿园厘米 绘制有上千位职业身份不同的人物 员20个商店的招幌匾牌。这幅画卷给观者的整体感觉是城市的街衢已经渐渐拢不住庞大市声与人群的喧嚣,似乎在暗示偌大的城市街区正时刻面临着被快速增长的市场和人群拥塞、甚至胀破的巨大危机。而较晚近的事例则是上海猿5年间建城与拆城的历史变局。早在明嘉靖年间,上海人为抵抗倭寇侵袭,“斯城不筑是以民委之盗也”,市民自发捐资建城,“开筑城垣,以为经久可守之计”。^①而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上海成为近代远东的大都市,“因城垣阻碍,县市难兴”,“非亟拆城不可”。又是在市民工商户的强烈要求下,到 员50年上海城墙基本拆除完毕,由此形成了“现代”的上海都市雏形。^②

这种世界性范围内“城”与“市”相分离的趋势,与其说是古代城市构成的外部形制所引发的变化,倒不如说是世界城市发展过程中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内在危机和最终发生质变的结果。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伴之商品经济交往的增加,城市的社会功能定位逐渐从政治军事中心过渡到了工业、商业和文化中心。尤其进入近代以来,世界性范围内的工业革命带动了城市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吸引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大量人群的流动,劳动人口成为城市中的主要构成部分,其结果是带动了城市从消费性向生产性功能的过渡,从而确立了城市形象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分野,由此城市的空间形态也随之发生了微妙的潜变。早期确立城市之为“城”的醒目标志如城墙,开始从人们的视线中渐渐淡出,取而代之的则是越来越巨大的商业市场,以及联结各个商业网点之间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从“城”与“市”并举,到有“市”无“城”,是世界城市的总体发展趋势。这中间势必要经历着两者此消彼长的漫长过程,尤其近二百年来世界经济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城市数量和规模都空前扩大,城市的功能和作用也日益趋向复

^① 参见上海市地方志网站,网址: <http://www.shanghai.gov.cn>。转引自顾廷培、施福康主编:《上海社会大观》,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猿-怨页。

^② 参见顾廷培:《漫说上海的城墙》,施福康主编:《上海社会大观》,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0年版,第猿-怨页。

杂多元化，“市”作为一种先进生产力的组织形式，越来越成为现代社会生产和大众生活的主导力量。这种世界范围内的城市发展浪潮被人们称为“都市化”（胡建君语）^①进程——在未来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都市”都是这个发展过程中一种过渡性的社区聚居表现形态，而它的内涵和外延较之“城市”的概念则显得更为丰富和驳杂。

在中国都市发展的历史语境中，对“都市”一词的指称，较早的记录可参见《汉书·食货志上》：“商贾大者积贮息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都市。”有关“都”的记述则出现得更早。《干旄》（《诗经·国风·邶风》）中有“子子干旄，在浚之都”，《礼记》中有“筑城郭，

^① 关于都市化（胡建君语）的概念，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定义。一般人往往把都市化看作是反乡村化的过程。地理学家强调农村向都市转化过程中的空间结构和城市体系的转变。经济学家强调从农业向非农业经济结构的变化。人口学家则以乡村人口向城市集聚的程度作为评判都市化程度的标准。在我国往往强调都市化进程中人口变化的因素，比较有影响的定义是：都市化是居住在城镇地区的人口比例增长的过程，更确切地讲，是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化在城市集中的过程。而《失衡的中国》一书中是这样界定的：“城市化通常是指，人口向城市或城市地带集中，即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乡村人口向城镇人口的集中。这种集中过程表现为城镇数目的增加，也表现为城镇的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充。”今天，随着都市化内容的变化，都市化的概念亦发生了相应的变化。美国新版的《世界城市》一书就把都市化定义为：“都市化是一个过程，包括两个方面的变化。其一是人口从乡村向城市运动，并在都市中从事非农业的工作。其二是乡村生活方式向都市生活方式的转变，这包括价值观、态度和行为等方面。第一方面是强调人口的密度和经济职能，第二方面强调社会、心理和行为的因素。实质上这两方面是互动的。”人类学家认为：“都市化并非简单地指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城市和城镇，而应该是指社会中城市与非城市地区之间的来往和相互联系日益增多的这种过程。”在城市与乡村的相互渗透、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互相接触和融合后，产生了一种试图整合两者的社会理想，使其既含有乡村文明的成分，又含有城市文明的成分，这种现象即为“乡村城市化”（胡建君语）。随着乡村城市化而来的是城乡差别的缩小，农村的生产力结构、生产经营方式、收入水平及结构、生活方式、思维观念等的变化与城市逐渐接近、趋向同一。因此本书在借用“都市化”的概念中，其中就包含了对中国“乡村城市化”问题的思考。需要补充的一点是，人类学上习惯把城市的发展划成三个阶段，即前工业城市、工业城市和后工业城市。虽然在城市史上，前工业城市占据的历史最长，但人们认为真正的都市化应该是工业城市产生以后。

建都邑”的说法。而在《尚书大传·洛诰》中还有更为详尽的解释：“十邑而为都。”由这些记录引出了我们对古典意义上的“都市”行政区划和建制的具体理解。

探讨“都市”这个词汇在中国历史发展尤其进入近代以来世界工业文明进程中的语义演变,远非本书所能及,因为这其中起码还牵涉到了一个语词译介的问题。而我在本书中使用“都市”的概念则是截取了众多“现代”意义上的形态描述中的一种:按照《中国大百科全书》^①中的解释,“都市”是指“大量异质性居民聚居、以非农业职业为主、具有综合功能的社会共同体”。它偏重的是一种超越地域性层面的、社会文化形态学意义上的理解,从而与西方近代工业革命以来的“都市”概念发生了更多的可比性关联。需要再作一个简单的补充,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1840 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原有的封闭的、自然状态的城市发展遭到了空前的破坏,西方世界对中国殖民地化的经济文化侵略将中国大部分的传统城市都迅速抛进了都市化进程之中。我们承认两种文明激烈碰撞的过程中引发了对“都市”的理解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分殊,但这并不能从逻辑上进一步证明中国都市面对西方发达都市的“不成熟”或者“不完整”状态。事实上对于“都市化”的实质与历史逻辑发展路线,西方社会至今也没有提供出来一套成熟、完整的发展理念。直到今天这一切还都处于现代性的过渡进程和理论探索之中,而这一进程是世界各国都市发展历史、地缘政治环境、各自的文化干预与社会组织控制等诸多因素共同合力的结果。而另一方面,都市在巨大的形态嬗变中也还会保留自身文化传统中的许多痕迹,从而显示出本土文化的现代性特征。这一点表现在中国都市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同样也不例外。

面对新的生存现实,都市中的个体生存与现代都市公共空间、人与自然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型关系,由此所产生的文化和社会问题也逐渐凸显出来。从这个意义上看,“都市”与“城市”这

^① 《中国大百科全书》(简明版 1998 年修订版),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 年版。

两个概念的区分,不仅在于前者显示出比后者更为丰富的内涵和外延,而且也可以通过从古老的“城”文化向新兴的“市”文化的有意识偏移,表现出我们观察对象时所采用的研究视角的某种调整。也就是说,都市不仅仅是自身存在的客观事物,同样是由众多居于其间的市民亲身参与和感受到的都市。然而,出于不同身份、阶层和知识背景的市民,以及他们参与都市生产与消费的不同方式,最终造成了他们各自的都市意识大相径庭。这样一来,当重新阅读以都市生活为主要表现内容的小说时,我就不再将作品描述对象自身所对应的民俗差异、城市风貌和文化遗迹等等现实的地方性特征作为考察的侧重点。相反,我更倾向于借助文学叙事对于诸多都市体验的艺术抽象,进入构造现代都市意象背后的错综复杂的都市意识形态生成层面的解析。这其中不光是对饱含社会生活实感的都市文化心理的深度考察,也希望通过某种意识形态的动力分析,来考察它们各自对于现代都市小说审美形态所构成的意义。

事实上,相较于其他专业领域内的现代都市研究,文学作为联结现实生活与人类精神世界之间最活泼、最敏感的神经线,常常能够先于那些所谓合乎时代精神的理性逻辑判断,更为直接、更为繁杂地反映出都市在新的社会价值取向冲击下的种种精神境遇和价值碰撞。在这方面,东西方的都市文学一直都处于同步性的发展中。比如捷克汉学家普实克教授在比较考察了东西方的古代城市文学之后,指出:“约略在公元十三世纪,位于欧亚大陆两端的中国和西欧竟然同时实现了文学的城市化。这就使得以新方式写人、以新眼光观察人的本质存在成为可能。中国宋元时职业说书人的作品话本和意大利十四世纪作家薄伽丘的《十日谈》均系环境相似、大致同代的产物,均系试图如实反映人生的同一体裁(都市小说)的代表。”^①随着工业革命以来大量以都市生存体验为主题的优秀小说的涌现,表明“都市”已经成为世界文学所关注的一个重要主题。弥漫在现代都市中个体精神的异化、生存的荒

^① 普实克:《都市中心——通俗小说的摇篮》,转引自江原:《捷克学者普实克谈话本小说与十日谈》,北京:《古典文学知识》,1985年第3期。

诞感、生命的漂泊感与人性世界中巨大无形的压抑,在乔伊斯的《尤利西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死屋手记》、卡夫卡的《变形记》、艾略特的《荒原》和村上春树的《挪威的森林》中,分别以各自独具本土特色的文学形态,细腻地展示出全球化问题带给世界范围内人群普遍的精神恐慌和内部情感经验的巨大冲击。中国的都市小说也不例外,20世纪30年代的穆时英、刘呐鸥、施蛰存等作家的出现不仅弥补了“都会无诗人”的空缺^①,而且同样以饱含现代意识的本土化都市小说创作丰富了“都市文学”的世界性内涵。而进入1949年代以来,日益现代化的都市作为最具活力、变动性最强劲的文学描写对象,同样也成为构筑转型期的当代中国都市文化现代性图景的重要一维。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尽管以历史事实论,被指认为“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都市文学从主题到数量上都远比中国的都市文学显得更为丰富,而同样具体到1949年代以来的中国都市小说,我们也不否认中国都市小说在叙事主题、文学技巧、意象传达等方面受到了来自西方文学的启发,但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意义上,这些并不能说明西方都市文学精神对于中国都市文学命题的贸易影响意义,或者简单地借此论断出中国都市文学如何承载了西方都市意识的影子。就如我在前文所说,都市化是一个世界性范围内的过程,它是一个正在发生的过程,也将在未来长时期内持续发生着,因此当我们讨论置身于都市化狂潮中的中国大陆都市文学的时候,其实是将其放置在一个更为广阔的、动态的、世界性的都市文学发展格局中来考察。

^① 20世纪30年代,鲁迅先生曾经有感于被誉为“现代都会诗人的第一人”、苏俄象征派诗人勃洛克的《美的女人之歌》而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没有这样的都市诗人。我们有馆阁诗人,山林诗人,花月诗人,……没有都市诗人”,即没有“用诗底幻想的眼照见都会中日常生活”、“将精气吹入所描写的事象里,使它苏生”、“取卑俗、热闹、杂沓的材料,造成一篇神秘底写实的诗歌”那样的站在现代性的高度上描写都市的新文学。引文见鲁迅:《十二个后记》,《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00页。